

日本副首相麻生竟然鼓吹学习纳粹

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予以强烈谴责 要求遏制日本右翼势力扩张

欧盟需要学会容忍

里查德·罗斯

针对欧盟有两种声音。最普遍的指责认为，欧盟体系对欧盟民众是不负责任的，“民主赤字”问题凸显。来自各国政府的声音则认为，应继续强化欧盟的权力体制，避免过于关注各自选民，进而忽略了欧盟创建“更紧密的联盟”的目标。

各成员国的执政党应对选民负责，但欧盟的经济紧缩政策在选民中却不受欢迎。法国总统奥朗德因此陷入两难境地，布鲁塞尔方面的压力迫使她削减公共开支，而他所在的政党要求保证法国预算免受削减。此外，政府要对议会负责，这迫使英国首相卡梅伦收回赋予欧盟的权力，旨在使国会议员满意。法院可否决或警告政府在欧盟层面上的决议，就如葡萄牙和德国的法院做过的那样。

欧盟“民主赤字”来自民主要素的欠缺。欧盟体系内权力机构彼此相互制衡并接受法律约束，但民众却无法直接通过投票来左右欧盟的行为，这造成欧盟层面与国家层面政策失衡。在欧盟理事会上，各国政府致力于扩展欧盟权力。欧盟基本条约被视为宪法，但只有少数国家对欧盟基本条约进行了全民公投。

如果当选代表所持观点与民意意愿相符，这些失衡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欧盟基本条约假定所有成员国都同意“更紧密的联盟”。民意调查显示，欧盟中间选民更希望保持现状，他们既不支持“更紧密的联盟”，也不同意收回已赋予欧盟的权力。欧洲议会中政客和民众间的失衡更加严重。

欧盟机构应对欧元区危机的举措使其权力日益增大，各国政府制定的预算，逐渐受制于超国家的欧盟委员会审查，若拒绝则会被罚款。欧盟试图拯救欧元区的措施是必要的，然而选民关注的仅是本国问题，他们根据政府对本国的作为进行投票。在爱尔兰，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执政党会被赶下台。在意大利，推行欧盟应对危机的政策，却没有得到本国选民支持的政府亦有下台的风险。

欧元区给民主责任制带来的问题，无法通过欧洲议会提名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方式解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并不是欧元区政策的关键决策者。进行决策的是欧盟委员会的专家和欧盟理事会的各国政府首脑，特别是那些主要债权国和债务国。

政策的稳定性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主责任制带来的问题。但根据欧盟的计算，这已不太可能发生。长期不成功的紧缩政策让国家政府更加脆弱，在面临欧盟巨额罚款的同时，丧失本国选民的支持。

面对国家层面与欧盟层面的政策冲突，人们需要接受当下的失败。当欧盟委员会的官员意识到，某些目标不可能在当前世界经济条件下实现时，就要容忍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经济状况与选民需求来制定预算。

(作者为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gipl@pd.people.com.cn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据日本媒体30日报道，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29日晚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说：“(德国)魏玛宪法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纳粹宪法。如果我们学习(纳粹)的手段怎么样?(国民)不再争吵，并且会接受(修改宪法的事实)。”

麻生太郎的言论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专家学者纷纷表示，麻生太郎此番言论，是对全人类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应强烈谴责，积极采取行动，共同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若在德国，就是“煽动民众罪”

此外，关于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内阁是否在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麻生表示，“不向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和感谢是不合理的”，“安静地去参拜就行。毋须只在战败的日子去参拜”。此间分析人士称，麻生太郎发言所流露出的喜爱纳粹的倾向值得全世界关注，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自民党控制了参众两院，麻生希望参照纳粹手法，快刀斩乱麻，尽快推动实现宪法修改。

日本前众议员首藤信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简直不敢相信副首相会说出这样的话，对于麻生直白地赞扬纳粹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在德国这种发言将被判刑，虽然日本并没有相关法律，但麻生的发言违反常识，这绝对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应该说的话，麻生的发言也将成为日本轻视人权的证据。

日本每日新闻社前驻德国记者村田信彦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德国赞扬纳粹

的行为按照刑法将以“煽动民众罪”被判3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奥地利，“煽动罪”将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学习纳粹手法”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话将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大利同为二战轴心国之一，虽未像德国采取立法手段禁止相关言论，但绝大部分意大利人都将法西斯和纳粹作为耻辱。

日本社民党本部和和平市民委员会前事务局长藤田高景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该发言暴露出麻生副首相缺乏教养、愚蠢的本质，这种试图以纳粹为榜样学习的话完全缺乏常识。麻生不具备担任副首相的资格，应该立即辞职。另一方面，麻生的发言也证明了修改日本宪法非常困难。

日本政坛右倾化导致出格言行登场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30日称，麻生的发言显然伤害了很多人，单是提及纳粹政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对于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周边国家以及有良知的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

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强烈谴责麻生的言论。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发言人洪志晚称，日本领导人不能因为参议院选举结果，就沉溺于对过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幻想之中，而应直面现实并认真思考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定位。韩国最大在野党民主统合党发言人朴用镇称，麻生的发言是军国主义野心的露骨表现。韩国政府应号召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日本右倾化。

韩国汉阳大学日本学国际比较研究所所长李康民对本报记者表示，麻生太郎

被称为“失言制造机”，曾因“大嘴”被迫辞去首相职务。这次他的“妄言”大背景就是日本政坛的右倾化，越出格的言行越能获得掌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抬头，麻生的此番言论是为了迎合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赵洪指出，自民党推动修宪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借助修宪搞乱亚洲。

日本不断激化与邻国矛盾对东亚稳定不利

波兰科学院政治事务研究所亚太中心主任、著名东亚问题专家瓦尔德玛尔·加克教授向本报记者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

最邪恶的一幕。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否认侵略历史，这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世界都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值得世界各国人民高度警惕。麻生太郎的言论，是对全人类的公然挑衅，更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极大威胁。国际社会应强烈谴责，积极采取行动，同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联手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韩国联合通讯社评论称，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以及一系列试图掩盖战争罪行的言论，使韩日关系面临持续紧张和恶化的局面。

德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卡尔·皮尔宁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麻生太郎的言论让人十分担忧。他表示，日本政治家的右翼言论可能会引发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矛盾激化，对于东亚的政治局势也是不利的。

(本报记者刘军国、马菲、万宇、李增伟、郑红、李宁、韩震)

>> 点评

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麻生太郎此番演讲是日本迄今为止关于修改宪法言论中最出格的一番话，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谴责。日本宪法是日本根本大法，第九十六条明确规定日本宪法的修改要经过参众两院2/3以上多数赞成，在国会必须经过充分讨论，同时也需要日本公众对国家的根本大法进行充分协商。这是日本目前的法制规定，也是国际常识。

麻生太郎讲这番话，反映出他作

为一个日本国民既不尊重日本宪法，也不尊重民意。采取纳粹手段这一说法完全表明了他对日本国民持无视态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势力及其军事独裁的做法给亚洲邻国和日本自身带来的严重损害没有任何反省。可以肯定的是，麻生太郎这番话反而会使日本民众了解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因此需要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日本政坛的发展。

(本报记者王迪采访整理)

金正恩凭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强调坚定传承朝中友谊的接力棒

本报平壤7月30日电 (记者王莉、程维丹)据朝鲜《劳动新闻》30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9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烈士，并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

报道说，在乐曲声中，以金正恩的名义和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敬献的花圈分别安放在烈士陵园和毛岸英墓前，金正恩与陪同的党政军负责人一起肃立默哀。

报道说，金正恩瞻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和毛岸英墓。金正恩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高洁牺牲精神将永远活在朝鲜军民的心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是历史的见证、朝中友谊的象征，不仅要保存和管理好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而且要重新好好修缮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并借此加强教育工作。

报道说，金正恩强调，永远不要忘记朝鲜人民经受考验的时期，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给予的国际主义无私援助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献出的鲜血，坚定传承朝中友谊的接力棒。

郭声琨会见新西兰移民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侯丽军)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30日在京会见新西兰移民部长迈克尔·伍德豪斯。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开展追逃，保障和促进两国人员正常往来交换了意见。

王毅将出席中国—东盟高层论坛 并访问马来西亚、老挝和越南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30日宣布：应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素拉蓬、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老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通伦和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日至6日赴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高层论坛并对马来西亚、老挝和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7月29日，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大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民众通过教堂外广场上的大屏幕收看葬礼仪式，为西班牙“7·24”列车出轨事故遇难者默哀。新华社发

图片新闻

欧盟贸易委员称开诚布公是解决贸易争端关键

暗示将用光伏谈判模式解决电信争端

本报柏林7月30日电 (记者管克江)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欧中之间贸易额巨大，出现贸易争端正常，关键要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加强对话。他表示，光伏和解决方案可为解决欧中其他贸易问题定下基调。

德古赫特在布鲁塞尔说，在欧中就光伏倾销问题达成和解后，有一些声音认为这是“向中国屈服”，将摧毁欧洲的光伏产业，他对此表示反对。他强调，这个和解方案是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消除非法倾销对欧洲光伏产业造成的伤害，二是保证欧洲用户和消费者

能继续从廉价进口光伏组件中获益。为此，70%的中国光伏出口商承诺了最低出口价格，它们将不再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另外30%的出口商将从8月6日起被征收47.6%的惩罚性关税。其次，价格承诺只适用于一部分欧洲市场，将显著低于目前中国所占的80%市场份额，在超出配额的部分，中国所有出口企业将被征收惩罚性关税。

德国中国商会代理干事长、法律问题专家段炜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德古赫特宣布欧中达成和解方案后，预计8月2日欧盟委员会将做出支持性裁决，完成法律程序。他表示，在德

国中国商会在同德国政经各界接触过程中，对方反对贸易战的立场非常积极。他们对中欧妥善解决电信设备争端问题表示乐观。

彭博社报道认为，虽然德古赫特表示在欧中光伏谈判时没有涉及电信设备，但他29日的讲话暗示欧盟将采取光伏谈判模式，同中国在电信设备问题上达成和解。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泽林30日在《商报》撰文，认为光伏和解给人们留下了三点思考。一是德古赫特没有在欧盟层面获得政治共识就盲目发动双反调查，由此引发中欧贸易摩擦扩大，一时难以消除影响。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贸联系紧密，难分你我，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已经过时。三是随着世界格局转换，欧美再也不能主宰话语权，随意打压中国等金砖国家了。

助推中国一流家电俏销巴西

本报驻巴西记者 颜欢

花大气力组织巴西客户“中国行”，邀请他们到格力公司总部考察，实地考察格力规模庞大的生产线和上百个高新技术实验室，了解中国品牌一流的管理和产品质量，也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巨大变化

1998年，岳海平在大学毕业进入格力空调工作。几年后，他被派往巴西管理分公司。再后来他又白手起家创业。虽然历经艰辛，但他感到祖国日益强大的脚步，为他这段疲惫曲折的旅途送来温暖。岳海平刚到巴西时，格力在当地还无人知晓。不少经销商和消费者都以为格力是“价廉质差”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巴西空调市场长期被美国大公司垄断，这些公司出售的机型却非常落后——噪音大耗能大，甚至还保留着几十年未更新的窗机空调。岳海平想到，要想在巴西站稳脚跟，首先要改变巴西人对中国和中国产品的想法。于是，他决定首先加大推广中国产品的力度，树立“新颖实惠、创新专业”的品牌形象。

岳海平花大气力组织巴西客户“中国行”，邀请他们到格力公司总部考察，实地考察格力规模庞大的生产线和上百个高新技术实验室，了解中国品牌一流

的管理和产品质量，也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巨大变化。由此，巴西人逐渐改变了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印象，也摒弃了对中国产品的偏见，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中国公司进行全方位合作。

之后，岳海平开始在巴西自主创业。岳海平说：“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已逐步从当初的代工生产转变为如今的创品牌发展，苏宁和国美就是成功范例。我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巴西，投资建设适合巴西国情的电器销售连锁店。我也希望通过努力，成为越来越多积极走出去的中国一流家电品牌进入巴西市场的助推器，帮助它们避免再遇到格力初入巴西市场时的种种困难——这也是我期待能够利用自己的经历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初衷和梦想。”

生意渐多的同时，岳海平开始关注巴西对中国的形象传播。“曾经，巴西媒体也戴有色眼镜看中国，大部分媒体没有驻华记者，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都不经取证直接引用欧美媒体的报道。”岳海平回忆道，“比如几年前关于西藏的报道，巴西两大主流杂志《看吧》和《时代》都直接引用了欧美的错误报道，称西藏和平解放前是一个独立国家，误导广大读者。不少华侨华人看了后非常气愤，我马上自费请巴西律师分别写信给杂志社

编，对他们的错误报道逐一进行批驳，但律师信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随着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将中巴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不断拉近，巴西媒体也接受了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的新形象，并从心底开始认同中国的崛起为巴西、为世界的发展都带来了难得机遇，巴西民众也开始主动关心和了解遥远的中国。

“初来乍到，我走在巴西的街头，热情友好的巴西人都会主动打招呼，但总误以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第一批到达巴西的移民，人数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和个人来巴西投资发展，身边的巴西人不但对中国越来越熟悉，而且有一些还开始学习汉语，走在街头也经常能听到‘你好’、‘谢谢’！”

“祖国强大了，我们作为旅居海外的侨胞，更要与时俱进，力所能及地多做一些事情，帮助和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认识、了解真实的中国。”岳海平说。(本报巴西利亚7月30日电)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2013年第15期(总604期)
8月1日出版
编辑：求是杂志编辑委员会 出版：求是杂志社

怎样看我国消费率的高低?
——与专家对话 本刊记者 郭斐然
打造现代旅游业这一新引擎 鲁勇
国有企业更应破除“官本位” 王学冷
·求是笔谈·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三人谈
把握好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张晓明
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目标 范卫平
把着力点放在提升发展质量上 陈冬
·文化发展与创新·
文化产业如何成为支柱性产业? 姜勤俭
·社会建设与管理·
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体制变革 李培林
惠民工作与分发烧饼 孙绍骋
·科技与教育·
自主创新 再创辉煌 何文波
·观察与思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消费观?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生活与哲学·
防止“形式”折腾“内容” 何冠军
·世界风云透视·
网络不应成为美国霸权新工具
——从“棱镜门”事件说开去 郭纪
欧洲经济转型和复苏步履维艰 丁纯
·百家言·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等6则
..... 王一鸣等

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
..... 范长龙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实现中国梦要大兴学习之风 袁纯清
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真功夫 付志方
做好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思想准备 蒋金铨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央国家机关如何严格要求做表率? 李智勇
群众路线：聚力中国梦的根本工作路线 毕京京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石平
·国防与军队现代化·
高扬艰苦奋斗光辉旗帜接力前行
——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先进事迹
..... 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
强军之路要以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为先导 孙思敬
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是时代的需要
..... 李吟 蒋勇
·经济改革与发展·
监管执法：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 肖钢

9 July 2013
1079 words

ChinaEu

For PEOPLE'S DAILY, China

HAS THE EU TOO MUCH OR TOO LITTLE DEMOCRACY—OR BOTH?

Professor RICHARD ROSE

There are two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for the limited commitment of Europe's citizens to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charge most often made at the national level is that EU institutions are not accountable to EU citizens and there is therefore a democratic deficit. The resistance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initiativ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EU's powers has led Brussels policymakers to charge t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citizens that democratically choose them and not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EU's goal of an ever closer Union.

National democracy presents challenges to the EU in many different ways. Partie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voters and the economic austerity policies of the EU are unpopular with national electorates. This creates problems for the French president, who is being pushed by Brussels to cut public spending, and being pushed by his own party to protect the budget of France from cuts. Government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parliaments, forcing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 make demands for the return of EU powers to London in order to satisfy his MPs. The courts can strike down or impose cautions on w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do at the EU level, as courts in Portugal and Germany have demonstrated.

The European Union is vulnerable to the charge that it has a democratic deficit because it has only two of the thre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Its institutions impose checks and balances on each other and are subject to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a third essential is missing: Europe's citizens cannot hold Europe's government directly accountable at the ballot box.

The result is an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r commitment to EU and national decisions.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national governments represent states with the plenipotentiary powers to bind their country to treaties that expand the EU's powers far

into the future. EU treaties are the equivalent of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virtually every member state requires special provisions to modify its national constitution. Treaties are agreed at the EU level by member states and ratified by national parliaments. Few states hold referendums on EU treaties; thus, from 72% to 99% of EU citizens have not had a vote on treaties creating an ever closer Union. Treaty commitments cannot be justified by a national government reminding its citizens that a majority have given their approval.

These imbalances would not matter if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held views that matched those of their citizens,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EU treaties presuppose that all member states are committed to an ever closer Union. However, opinion polls show that the median EU citizen favours keeping the EU as it is rather than supporting either an ever closer union or the opposite, repatriating EU powers to member stat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is greater still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ive-sixths of MEPs favour more integration, but only half those who vote in an EP election agree with the views of their MEPs. Votes are given because of national party loyalties and interests without regard to EU policies. However, the eurozone economic crisis is beginning to dissolve the line separating national from European issues. A surge in votes for protest parties at the 2014 election would mak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visions among Europe's citizens, but challenge the consensus with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at an ever closer Union is desirable.

Technocratic measures dealing with the eurozone crisis tilt the balance toward more powers being claimed by EU institutions with less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The budgets prepar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s are now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supra-national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tments embodied in documents called treaties but not popularly ratified give the Commission the power to tell an elected government to reduce spending and/or raise taxes to bring its budget within EU rules. Doing so will impose immediate and visible costs nationally with a more or less distant promise of benefits. Refusal can result in an unco-operative government being fined many millions of euros. The EU's authority over national budgets can be justified as necessary to save the eurozone. However, in national elections the issue is national. Voters have a chance to endorse or reject the government in the light of what it has done for the country. A governing party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an economic crisis can be turned out of office, as happened in Ireland. But a government responsible for introducing EU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can also be turned out of office by its country's voters, as has happened in Italy.

The challenge that eurozone rules present to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cannot be disposed of merely by European Parliament Groups nominating candidates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president is not the key decision-maker for eurozone policy. Power has now passed to supra-national technocrat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o heads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European Council, especially the head of the major lender state, Germany, and the heads of major debtor states in the Mediterranean, of which there are an increasing number.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could be eased by stability policies that quickly produce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governments could then claim credit for the popular consequences of unpopular austerity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EU's own calculations, this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Sustained austerity without success would leave a national government vulnerable an EU fin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uros and to rejection by its national electorate.

Alternatively,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and EU policies could be resolved by technocrats accepting the failure of their prescriptions. This could be done by replacing fines with fudge, that is, changing the target for budget deficit from three percent to a vaguer goal, such as a falling deficit, and lengthening the number of years before a goal need be met. As and when Commission officials realize that their targets are impossible to achieve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y will have to tolerate national governments deciding their own budgets on terms that are both economically practicable and can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when the government is held to account by its national electorate.

Richard Rose is author of *“Representing Europeans: a pragmatic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